

【空间布局】

转型过程中区域结构的变化

——对中国和东中欧国家的比较分析

GYURIS Ferenc

(匈牙利 Eötvös Loránd 大学区域科学系, 布达佩斯 2030)

齐清波译 李青审校

【摘要】 中国和东中欧国家的经济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显著的变化。本文讨论了两者的空间模式及区域不平衡的规律性。在简要回顾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后,本文运用空间自相关、多元回归和线性相关分析了区域不平衡的模式。研究显示,经济结构对区域不平衡的作用日益减小,而地理位置的作用日渐凸显。本文继而分析了空间结构的变化及其长期稳定性问题,通过等级相关分析和专题制图,确定了中国和东中欧比较稳定的发达和不发达的地区。本文还通过胡佛指数揭示了东中欧国家首都对一国空间模式的显著影响。本文最后对金融危机的历程及未来走向进行了分析,重点探讨了中国和东中欧国家调控措施、区域规划目标及实践的差异。

【关键词】 区域差异; 中国; 东中欧; 空间结构; 经济危机

【中图分类号】 F061.5; F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2078(2010)01-0021-14

一、引言

自二战后的经济繁荣到石油危机期间,区域差异是资本主义国家区域研究的主题之一,许多学者发表了相关成果。很多成果是对一国内部进行的研究,也有许多对多国的比较研究。通过大量实证研究,学者们在区域不平衡及其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等现象的背后,揭示出了若干规律(Williamson, 1965; Amos, 1988)。

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学术界对区域差异的关注开始减少,此间人文地理学家对数学模型的应用和整个实证主义方法进行了批评(Kitchin, 2006)。不过,区域学家仍继续关注区域差距问题,研究重点逐步放在邻近效应和由于不平等(如移民)所导致的地区流动或全球差距等方面(Nemes Nagy, 2009)。

20世纪90年代对差异的研究再次兴起。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欧的瓦解,重绘了这些国家的经济版图。伴随中国经济奇迹出现的严重不平衡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大量区域统计方法的出现和完善,使得区域专家能够运用多种方法检验那些描述西方国家案例的模型。东欧(包括前苏联)和中国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相似之处:(1)经济由完全政府控制型转向更加自由化;(2)更多地融入国际经济;(3)显著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社会紧张问题受到普遍关注。

同时,中国和东欧也存在显著的差异。1978年以来中国进行了渐进式改革,保持着年均10%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东欧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则经历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剧变,建立了新的民主政治框架^①,但经济和生活水平严重下降,失业问题日益严峻。

此外,还需要考虑东欧国家的异质性:前南斯拉夫曾选择了一条介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

【收稿日期】 2009-11-03

【基金项目】 本文和本人参会均根据匈牙利全国研究和技术办公室的1.3原则由Mecenatúra基金提供资助。

【作者简介】 GYURIS Ferenc(1985—),男,匈牙利 Eötvös Loránd 大学地理科学系助理教授, E-mail: gyurisf@gmail.com。

^① 中国和东中欧政治经济方面各型的系统改革的理论背景详见 Csanádi (2006) 的描述。

条道路并于1991年后瓦解,其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随后陷入可怕的内战,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局势独特,因为他们在60多年的时间中都不是一个独立国家。阿尔巴尼亚在1978年以后受到东正教斯大林式的统治,没有官方的国际关系。前东德于1990年与西德合并,此后它遵循两德统一后的目标,在大量西德资本的支持下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体制结构瞬间瓦解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

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曾经都是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经过转型后的下滑后,千禧年前其经济已逐步稳定并持续发展,目前已全部加入了欧盟。这些国家也存在着差异: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变革之前没有经济自由化的迹象,因此随后的社会经济恢复缓慢。波兰遭受其之前经济体制功能紊乱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实行的休克疗法使其经济急剧转型。匈牙利的经济变革更为渐进,从20世纪60年代起,相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的经济政策相对宽松,它在1982年就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使得私营经济逐步发展。上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六国可以归为一类进行分析。本文所说的“东中欧”还包括斯洛文尼亚,它曾为前南斯拉夫的成员,在内战后保持完整,并与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和波兰的经济政治基本相同(图1)^①。



图1 “东中欧”包含的国家

资料来源:欧洲政治地图,佩里卡斯塔涅达图书馆地图收藏。

除了这些与体制相关的问题,中国和东中欧不同的自然、社会和经济地理规模同样也需要考虑。东中欧地区人口9520万、面积90.2万平方千米,名义GDP为1.37万亿美元,中国的对应值则分别为东中欧的7倍、10.6倍和3倍。但是,由于中国和东中欧具有经济转型和经济背景变化的共性,因此,对两者区域差异规律的变化进行比较是科学可行的。

二、区域差异的格局

1. 经济改革引起的空间重构

经济结构调整对东中欧和中国的区域差异影响很大。东中欧国家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几十年里,其经济结构严重影响着地区发展水平。重工业区的人均生产总值相对较高,且都处于煤炭资源丰富的山区,

^① 目前对东中欧和东欧、中欧的准确定义还没有共识,其含义常因语境不同而改变。20世纪,确定欧洲的中心是关乎政治地理重要性的问题。因此,不同国家基于不同的地缘政治兴趣而以不同的方式定义过它的位置(Beluszky, 1995)。此外,“东中欧”一词是指中欧的东部(作为一种物理地理名词),而“东欧”通常是一种政治表达,指原属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这两种分类在地理上明显相互重叠。

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体系,其发展是以煤和矿产等自然资源为基础。此外,以相对发达的工业和第三产业为特点的省会城市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中心城市,也都属于这些国家的发达地区。相反,使用大量生产资料以及城市化水平低下的农村则处于发展的末端,它们地处偏远,经常靠近或者位于边缘地区。

然而,经济转型重绘了经济的空间结构。尽管省会城市可以进一步提高其优势地位,但是重工业区的主要产业却明显衰退,大部分欠发达地区的下滑趋势也比以前更快,它们都属于“输家”。而“赢家”主要是相对靠近欧洲经济核心区的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成功地吸引了外国投资,它们是所有东中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Pavlínek, 2004; 单个国家的案例见 Domański, 2003, Fazekas, 2005)。类似地,与房地产市场完全集中时所不同的是,强大的郊区化形成了大量主要城市地区的“左邻右舍”。总之,原来严重地被部门结构及矿产资源分布所影响的空间结构改变了,区位成为重要因素(Nemes Nagy-Jakobi-Németh, 2001; Timár-Barta-G Fekete-Kukorelli Szörényiné, 2005)。尽管类似变化也发生在具有一定发展水平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在前社会主义社会国家,没有经济改革就没有这些变化(Nemes Nagy, 1987; Lőcsei, 2004)。

区位差异的日益明显可以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来证明。在已有方法中,我们选择如下公式:

$$r = \frac{\sum_{i=1}^n (x_i - \bar{X})(y_i - \bar{X})}{\sqrt{\sum_{i=1}^n (x_i - \bar{X})^2 \sum_{i=1}^n (y_i - \bar{X})^2}}$$

其中, x_i 为某地区的人均GDP; y_i 为其相邻地区的平均人均GDP; \bar{X} 是全系统或全国的平均人均GDP。 r 的理论值为 $-1 \sim 1$ 。 -1 表示棋盘分布规律(贫富比邻型), 0 表示相邻地区的发展水平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1$ 表示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各自相对集中分布(物以类聚型)(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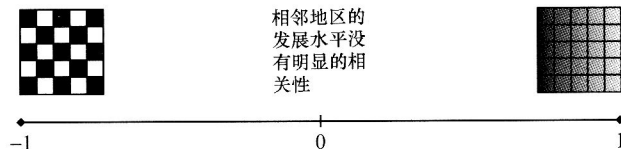


图 2 空间自相关标准下的理论区间及其对应的空间格局

计算匈牙利县级单元(共有 20 单位,即 19 个县和县级单位以及首都布达佩斯)的 r 值时,给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得到结果是 1975 年 $r = -0.49$ ^①,倾向于贫富比邻型。这是因为高度发达的重工业地区周围是没有重要矿产资源的贫困地区,它们不能参与快速发展的工业化过程。然而,1995 年空间自相关的值是 -0.07 ,2006 年是 $+0.29$,反映出越来越明显的地理邻近效应(发达地区对它们的邻近地区有明显的正面影响,但是对距它们较远的地区则没有影响)。

虽然现有统计数据难以使我们计算分析其他东中欧国家的情况,但根据雷乔区域数据库,我们可以计算出 1995—2006 年的情况。欧盟区域政策所采用的 NUTS 系统^②为分析提供了便利。NUTS 系统包含 NUTS1, NUTS2 和 NUTS3 三个空间等级,并按面积和人口规模的大小依次归类^③。LAU 系统是对 NUTS 系统的扩展,它对更低级别的地区划分出两个以上的类型(LAU1 和 LAU2)^④。有关东中欧国家的情况见表 1。即使各国存在显著差异,但一般 NUTS2 单元可以解释为“地区”、NUTS3 单元为“省”、LAU2 单元为“市”。

在一个特定的分类框架内,由于各地平均面积和人口规模的明显差异而难以进行彻底的比较分析。不

① 匈牙利中央统计局于 1994 年首次计算和公布区域 GDP 数据。1975 年的数值是由 Nemes Nagy (2005) 科学计算求得。

② NUTS(法文缩写为统计用的地区单位命名法)是欧盟统计处对成员国行政系统的不同空间层级进行归类的统计系统。

③ 所有的区域分类基于国家行政体系,且各国的平均规模存在差异。官方明确规定:NUTS1 单元的人口数应在 300 万至 700 万之间;NUTS2 单元人口数应在 80 万至 300 万之间;NUTS3 单元人口数应在 30 万至 80 万之间。然而,此规定有一定的弹性,因此许多各级 NUTS 单元的人口数显著高于或低于官方建议的上下限。

④ LAU1 和 LAU2 起初命名为 NUTS4 和 NUTS5(LAU 指地方行政单元)。

过,即使不能直接比较以各国人均 GDP 计算的空间自相关值,但是它们在 1995—2006 年的变化却也明显地反映了其真实的趋势。除了斯洛文尼亚,其他国家的空间自相关值在这一期间是上升的,到了 2006 年,所有的国家都是正增长(表 2)。

表 1 东中欧国家 NUTS1、NUTS2、NUTS3 和 LAU1、LAU2 单元的数目、平均面积和平均人口

(个, km²)(千人)

国家	NUTS 1	NUTS 2	NUTS 3	LAU 1	LAU 2
	2	6	14	264	5329
保加利亚	55456	18485	7922	420	20,8
	3804	1268	543	29	1,4
	1	8	14	77	6249
捷克	78864	9858	5633	1024	12,6
	10477	1310	748	136	1,7
	3	7	20	168	3152
匈牙利	31010	13290	4652	554	29,5
	3344	1433	502	60	3,2
	6	16	66	379	2478
波兰	52114	19543	4738	825	126,2
	6350	2381	577	101	15,4
	4	8	42	—	3174
罗马尼亚	59375	29688	5655	—	74,8
	5375	2687	512	—	6,8
	1	2	12	58	210
斯洛文尼亚	20251	10126	1688	349	96,4
	2047	1024	256	35	9,7
	1	4	8	79	2928
斯洛伐克	49012	12253	6127	620	16,7
	5414	1354	677	69	1,8

资料来源: Nemes Nagy 2009; 2009 年 CIA 世界概况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表 2 NUT3 区域的东中欧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空间自相关系数

国家	N	1995	2006
保加利亚	28	-0.09*	+0.25
捷克	14	-0.29	+0.25
匈牙利	20	-0.07	+0.29
波兰	66	+0.17	+0.21
罗马尼亚	42	+0.48	+0.70
斯洛文尼亚	12	-0.16	-0.24
斯洛伐克	8	+0.55	+0.68

中国在改革以来区域格局的变化也很明显。尽管 1978 年之后各省经济增长迅速,但一些省份的经济地位在改革开放前后还是有所变化^①。原来中国东北领先的重工业地区相对落后很多,“铁锈地带”即黑龙江(在地区排名中下降了 7 位)、吉林(下降 5 位)、辽宁(下降 4 位)、重要煤矿产区山西(下降 4 位),同时中国内地的一些省份发展水平比较低,其经济主要依赖于煤炭开采和冶炼行业(青海下降 14 位、甘肃下降 13 位、

^① 中国各地区 GDP 数据来源于密歇根大学中国数据中心。数据通过 CSANÁDI Mária 主持的“中国系统转型的区域差距”课题得到。此课题由匈牙利国家研究基金会资助,数据的有效性得到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证实。许多学者批评中国区域经济统计数据,特别是 1978 年之前的统计数据,这一情况应予以考虑(Rawski, 2001)。然而我们的观点与 Holz (2005) 和 Chow (2005) 相近,即利用这些数据进行区域分析是完全可以的。

宁夏下降 10 位)。此外,一些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的情况更糟,它们很难吸引到新的投资(西藏下降 15 位、四川下降 8 位)。

另一方面,东部沿海省份从特殊的经济地理区位和开放口岸中获益良多,它们成功地参与了全球经济。最大的“赢家”是福建(上升 15 位)、浙江(上升 13 位)、山东(上升 13 位)、广东(上升 7 位)。内蒙古(上升 8 位)的情况比较特殊,它的主导产业是采掘、冶炼以及化学工业,通过内陆地区内蒙古的快速发展可以观察到经济改革的积极影响(2006 年,内蒙古人均外商投资几乎是三年前的 20 倍,而全国的平均增长水平只有 83%)。辽宁省和直辖市北京,由于天津的溢出效应而吸引了外国投资的进一步流入。

总体上,东部省份^①经济实力显著增长,其地区生产总值从 1978 年的 59.8% 增加到 2006 年的 66.3%,而它们的人口比重则变化较小(从 51.9% 到 53.0%)。因此,东西差距在过去 30 年中进一步扩大。

此外,上述情况也说明在东中欧存在的经济结构重要性下降而区位重要性上升的现象在中国同样存在。线性相关显示出经济结构和省区发展之间的联系日益薄弱(见表 3)。1978 年的结果显示出存在发达工业—不发达农村的鸿沟,而这一鸿沟在 2006 年已不复存在。但是,农业比重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负相关性仍十分显著,因为农业对整个经济的贡献率已经降到了 11% 的低水平,不过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与经济发展之间却也没有显示出强烈的正相关性。

表 3 中国若干指标的线性相关关系(所有指标都已取对数)

变量	各产业占 GDP 比重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78 年人均 GDP	-0.93	+0.76	+0.12
2006 年人均 GDP	-0.85	+0.16	+0.36

数据来源:密歇根大学中国数据中心。

一方面,我们运用中国各省区 GDP 数据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计算出 1978 年、1990 年和 2006 年的相关系数 r 值分别为 0.39、0.41 和 0.60。这表明区位的重要性是一个先验因素。由于中国自然地理条件比东中欧国家更复杂多样,因此中国区位因素的影响比绝大多数东中欧国家更明显,中国和东中欧国家的变化趋势是相似的。

中国各省的多元线性回归反映了同样的现象。我们选取各省人均 GDP 的对数^②为因变量,自变量为与地理位置有关的各项指标^③:

- 地理位置:COAST 是虚拟变量,1 表示沿海,0 表示内陆,YCOORD 为各省省会的地理纬度^④;
- 人口分布:PDLN 为城市群,作为人口密集的代表,由于其集聚效应而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
- 经济结构:PRILN 为第一产业占 GDP 的比重;SECLN 为第二产业占 GDP 的比重;
- 资本和基础设施:FDILN 为人均外商投资;PTCLN 为每 1000 名居民所拥有的邮政和电信服务量;
- 对劳动力素质有直接显著影响的教育体系状况:THIGLN 为每 1000 名居民中从事高等教育的数量;TSECLN 为每 1000 名居民中从事中等教育的数量)。

我们运用 SPSS 软件进行估计,并将所有非显著变量逐步从回归模型中剔除,最终只保留回归结果显著的变量(见表 4)。

① 在本文中,这一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和广西。

② 对数可以充分对比数据系列以避免忽略非常规因素的扭曲效应。

③ 尽管我们选取的指标范围有限,但我们采用的变量已显示出发展不平衡的情况。

④ 尽管目前空间结构明显由沿海—内地二元模式所主导,但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十年,北方—南方模式是空间结构的重要特征。例如,1952 年各省人均 GDP 与其纬度的线性相关值是 +0.3,与其经度的线性相关值是 +0.31(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数据中心)。

表4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自变量	1952	1958	1966	1978	1990	2006
COAST	—	—	—	—	+0.301 (0.001)	+0.180 (0.013)
YCOOR	+0.294 (0.000)	+0.176 (0.016)	—	—	—	+0.167 (0.001)
PDLN	—	-0.130 (0.094)	-0.242 (0.012)	—	—	—
PRILN	-0.415 (0.001)	-0.724 (0.000)	-0.513 (0.001)	-0.588 (0.000)	-0.329 (0.029)	-0.195 (0.021)
SECLN	—	—	—	—	—	—
FDILN	—	—	—	—	—	+0.308 (0.000)
PTCLN	+0.051 (0.000)	+0.273 (0.002)	—	—	—	+0.384 (0.000)
THIGLN	—	—	—	+0.401 (0.002)	+0.476 (0.001)	—
TSECLN	—	—	+0.549 (0.001)	—	—	—
调整后的 R^2	0.908	0.925	0.844	0.898	0.868	0.948

数据来源:密歇根大学中国数据中心。

结果表明,1952—1978年,在所有自变量中,只有第一产业比重变量(PRILN)与人均GDP存在强相关关系。农业比重越高,地区贫困的可能性越大,这也是“贫困的农村”与“富裕的工业区”之间典型的二元结构。虽然一些变量在一定年份显示出与经济发展有显著相关性,但只说明这些关系在特定的时期内很重要,或者说没有长期的因果关系。从表4中可以看出,1978年以前所有变量之间的关系都不显著。

改革开放以后,地理区位的重要性逐步显现,沿海地区、北方和人均GDP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北方人均GDP较高主要是由于内地最不发达的地区在南方,不过这种分布似乎是随机的,而非因果关系,这些地区的发展主要受自然地理因素而不是区位优势的影响。另一方面,沿海地区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我们还发现外资流入和通信网络的重要性,这与东中欧的情况相同(Enyedi 2005)。同时,经济结构的影响比以前弱。值得注意的是,农业比重及农业重要性的降低主要是产业转型的结果,中国第一产业占GDP的11%,对经济的影响不是很强,而第二产业虽然占GDP的比重较高,但其重要性也并不显著,这说明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不是很重要。一方面,一些主要沿海地区和面临转型的老工业区的第二产业比重都比较高(如江苏和江西第一产业比重分别为7.1%和5.8%,第二产业比重分别为56.6%和57.8%,第三产业比重分别为36.3%和36.3%);另一方面,一些以服务业立足的发达地区和缺乏工业潜力但有相对完善的基本服务网络(如公共管理或教育和农村的医疗体系)的不发达地区,服务业比重也相当高。比如,西藏的服务业占比排名第二(55.0%),位居北京之后(70.9%)、上海之前(50.6%)。

总之,推动中国和东中欧空间结构的变化的一些因素是相似的,共性是地理区位作用的增强和经济结构作用的减弱。

2. 区域结构的长期稳定性

上一部分阐述了经济改革之后空间结构变化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在几十年中是否保持稳定呢?我们可以通过计算一国次级行政单元在两个时期的斯皮尔曼秩相关系数来认识,公式如下:

$$R = 1 - \frac{6 \sum_{i=1}^n d_i^2}{n(n^2 - 1)}$$

其中, d_i 为某地区的秩在两个时点间的差别(例如,以1952和2006年的人均GDP求出的秩), n 表示地区的数量,秩序相关系数(R)的可能值为-1(表示秩完全负相关)到1(表示绝对稳定性)。

下面计算一国不同区域在两个时期经济地位的关系。根据雷乔数据库我们可以分析东中欧国家1995—2006年的情况,结果显示这期间其空间结构很稳定,这一结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基本形成,只在1995—2000年间有一些小的变化(表5)。唯一的例外是捷克共和国,其很低的等级秩相关值说明1995年后其空间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也说明转型后它的空间重组相对较慢。

表5 NUT3区域东中欧国家人均GDP排序计算的等级相关关系

国家	1995—2006年	2000—2006年
保加利亚	—	—
捷克	+0.43	+0.83
匈牙利	+0.77	+0.93
波兰	—	+0.98
罗马尼亚	+0.77	+0.92
斯洛文尼亚	+0.89	+0.98
斯洛伐克	+0.95	+0.95

数据来源:雷乔数据库,欧盟统计局(EUROSTAT)。

根据1975年NUTS 3级GDP数据集,我们对匈牙利进行时间间隔更长的等级相关分析。1975—2006年的结果为+0.51,与近期的数据+0.77和+0.93相比,这一结果还算显著,这是由于以往发达的采掘和重工业地区的衰退、包括佩斯县在内的布达佩斯郊区圈的出现以及西部与奥地利接壤的那些县发展较好所致。

不过,等级相关值只是表明相对稳定状态,其中布达佩斯作为匈牙利的绝对中心稳定地处于榜首,而几个欠发达的农村地区与全国平均的人均GDP水平之间的差距更大了,但是这种负趋势使它们一如既往地处于较低的位次(匈牙利东部的Szabolcs-Szatmár-Bereg和Hajdú-Bihar、东南部的Csongrád和Bács-Kiskun、西南部的Tolna和Somogy)。一些经历过短暂衰退后重新获得发展的工业区在2006年的排名与1975相近,这主要得益于它们发达的基础设施和邻近西部边境或布达佩斯的区位。

这验证了Győri (2010)的结论,即影响空间结构的一些要素在整个20世纪都是稳定的。尽管由于数据不全不能对GDP进行长期分析,但对1910年人口普查时收集的教育、卫生保健、住房和就业结构的数据加总后,可以得到现在的kistérség((LAU1))地区的数据(本文写作时它有168个),且可以将其整理为综合的发展指数指标。把这个指标标记在图上,可以看出它与目前的空间结构相似(图3)。目前在布达佩斯—维也纳轴线(匈牙利西北部)附近的比较发达的区域,在1910年时发展水平也居于前列,这显然是由于它们处于匈牙利最重要的铁路和公路沿线而且靠近奥地利的有利区位所致。1910年布达佩斯地位优越,在21世纪前十年也是如此。而若干处于中等发展水平的农村区域以及许多至今保持很强农业特征的不发达边远地区一百年来地位未变,它们大多分布在匈牙利东北部的Szabolcs-Szatmár-Bereg县(Győri, 2010)。这些地区落后的主要原因是远离发达地区的区位优势劣势和劳动力素质较低的因素,在那些居住分散和基础设施薄弱的地区尤为如此,即使在农业为主的地区,由于气候寒冷、土地贫瘠、生产组织水平低下及劳动力外流,农业生产率也长期很低。

由于行政体系的变化,很难通过定量分析比较东中欧各国的情况。通观该地区的历史地理全貌,我们发现,匈牙利空间结构长期稳定的特征在东中欧其他国家同样存在。例如,波兰首府华沙及其南部的重要工商业中心克拉科夫、波罗的海沿岸主要港口城市(如格但斯克或Szczecin),长期以来一直是波兰1945年后创建的新边境地区最发达的地带。相反,波兰东部和东北部欠发达的农业地区Warmińsko-Mazurskie、Podlaskie和Lublin一直和匈牙利东北部相似,这里工业化程度低,服务业薄弱,劳动力素质较低,基础设施不发达,毗邻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变化最大的是先前发达的重工业地区西里西亚衰落了(表6),这与匈牙利的情况是近似的。其他国家的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分布也是比较稳定的,如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西部和西北部—罗马尼亚东部和南部之间;斯洛伐克主要的自然及经济和政治中心、西部的布拉迪斯拉发、东部的科希策—斯洛伐克中部和南部乡村区域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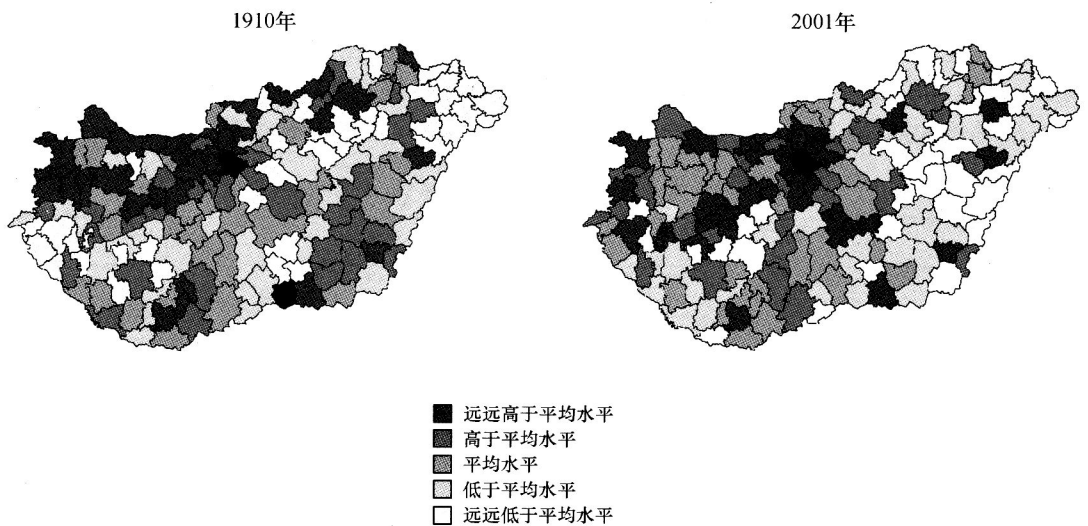


图3 1910年与2001年匈牙利 LAU1 区域的复合发展水平

资料来源: Györi, 2010。

表6 波兰各类区域及其相对发展水平: 长期发达的地区、转型引起的经济衰退地区和长期欠发达的地区

地区	1976 年人均收入	1999 年人均 GDP	2006 年人均 GDP
	为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		
长期发达的地区			
华沙	155	288	302
克拉科夫	126	150	160
格但斯克、格丁尼亚、索波特	119	147	146
结构变化和经济衰退地区			
西里西亚(原卡托维兹、琴斯托霍瓦、别尔斯科-比亚瓦)	123	107	106
长期欠发达的地区			
波德拉斯基(比亚韦斯托克、沃姆扎和苏瓦乌基)	71	74	73
卢布林(比亚瓦波德拉斯卡、海乌姆、卢布林、扎莫希奇、谢德尔采和塔尔诺布热格的部分地区)	73	71	68

数据来源: Bartosik-Bukietynski-Kaleta(1980), 雷乔数据库, 欧盟统计局。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首都对一国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显著, 它可以通过胡佛系数计算出来:

$$h = \frac{\sum_{i=1}^n |x_i - f_i|}{2}$$

x_i 和 f_i 表示某地占全国总值的比例 (x_i 代表 GDP, f_i 代表人口), 胡佛系数的可能值为 0% (指地区人均 GDP 之间无差异) 到 100% (从纯理论上讲, 这指有人口无经济产出, 及没有人口但有大量的经济产出的地区) 的拱形分布区间。通过胡佛系数, 我们可以求出一国某地区占区际总差异的比例, 因此城乡二元结构的程度可以通过统计分析得出, 在东中欧国家该系数极其显著(表7)。

表 7 以人均 GDP 计算的首都对全国的胡佛系数

国家	1975/76	1995	2006
保加利亚	无数据	无数据	47.0
捷克共和国	无数据	50.0	50.0
匈牙利	32.3	48.3	48.2
波兰	15.4	26.2*	26.2
罗马尼亚	无数据	30.4	32.0
斯洛伐克	无数据	46.5	43.6
斯洛文尼亚	无数据	47.7	49.5

注: * 代表 1999 年的数据。

资料来源:雷乔数据库,欧盟统计局;Nemes Nagy (2005) (1975 年匈牙利数据);Bartosik-Bukietynski-Kaletka (1980)、Nemes Nagy (1987) (1975 年波兰收入数据);Populstat (1975 年波兰地区人口数据)。

虽然收入和经济规模方面的历史数据非常有限,但首都在一国空间结构中的突出作用广为人知,这源于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早期民族国家建立时的中央式集权模式,尤其是在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二战后的社会主义时代也存在相似的情况,因为这一时期注重迅速工业化和空间与政治权力的集中,这导致首都的主导地位日渐增强。最近几十年,在社会主义后期,一些国家的这种效应由于分散的工业化而被部分抵消,如匈牙利或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Probáld, 2000)。唯一的例外是波兰,它在 1919 年前的百年间被普鲁士、哈布斯堡王朝和俄罗斯帝国所割裂,这三个地区的城市 and 经济发展依据占领国的利益而各自进行。

最后,改革显然增强了首都的优势地位,因为它们的经济结构不同,具有高素质劳动力(这也意味着更强的购买力)和发达的基础设施(包括物质设施和制度设施),这使它们能够较快地在经济全球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绝大多数东中欧国家的快速发展大概一半要归因于地区不平衡

接下来的问题是:空间结构的稳定性在中国存在吗?为此我们计算了不同年份省级人均 GDP 排名关系值(表 8)。计算结果出乎意料,1952—2006 年值为 +0.61,考虑到区域面积巨大、地理特征复杂且时间跨度很长,它表明中国的空间结构十分稳定。

表 8 基于省级人均 GDP 的中国等级相关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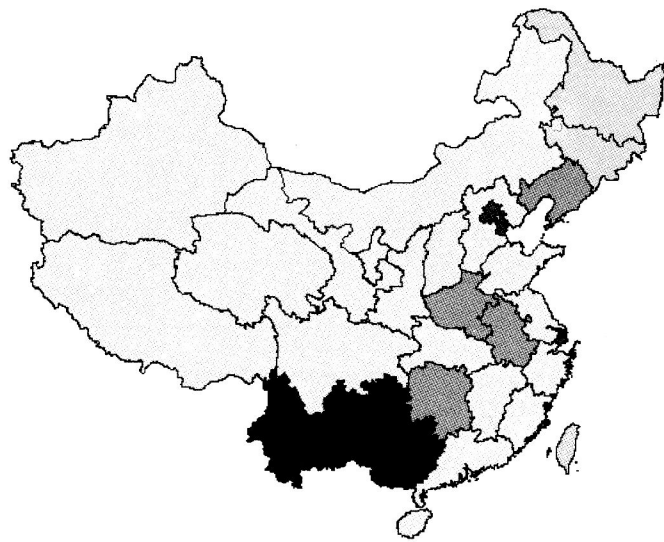
年份	1952—2006	1952—1978	1978—1990	1990—2006
相关关系值	+0.61	+0.83	+0.75	+0.89

资料来源:密歇根大学中国数据中心。

为了识别排名稳定的区域,我们算出了 1952—2006 年各省每年的排名,再把它们分别归入以下各组:(1) 前三;(2) 上三;(3) 前一半或后一半;(4) 后三;(5) 其他。结果如图 4 所示。一方面,前三集团一直由京津沪三大城市圈组成,这是由于其地理位置优越、劳动力素质高、基础设施好以及在全国公共管理、商业管理和经济产出方面的领先地位,同时也有统计因素,因为这些地方高度城市化。值得指出的是,这三个城市地区对全国区际差异的影响远远弱于东中欧国家的首都。通过以省级人均数据计算胡佛指数,2006 年上海、北京和天津对全国区际差异的影响只有 15.4%。

东北的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表现出相对稳定、良好的状态,但其改革前后差异明显:1978 年以前它们是重工业最发达的地区,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引擎。1978 年以后,它们不能再与快速发展的沿海省份竞争,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它们不得不面对传统产业的危机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它们近期能够归类于前一半组基本上得益于它们在历史上的高排名。辽宁的情况有些特殊,作为一个沿海省份,它吸引了大量外商投资,从而得以用竞争力强的新产业来弥补重工业的倒退,这是辽宁一直处于上三组的原因。

同时,华南的贵州、云南和广西一直处于后三位置,贵州自 1967 年以来就是最落后的省份。原因与上面提到的关于东中欧的情况相似:这些省区地处偏远,与首都相距遥远;尽管地形较差但农业处于主导地位;基础设施欠缺,人力资本水平低下,这都阻碍了其工业化进程。加之这些地区相对人口过剩,就业不足,其降低了本来就低的平均产出和工资,还有年轻熟练的劳动力大量外流,等等。



Chan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ank (1952—2006)
based on per capita GDP

- 无数据 (3)
- 前三 (3)
- 上三 (1)
- 前一半 (2)
- 后一半 (3)
- 后三 (3)
- 其他 (17)

图4 中国空间结构的稳态与变化(1952—2006)

资料来源:密歇根大学中国数据中心。

总之,东中欧和中国都有传统上的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与经济系统中的其他区域相比,欠发达地区似乎不能获得发展动力。从空间规划的角度来看,它们并不能从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及推动其发展的项目中获益(尽管在国民经济整体发展中通过再分配对这些地区给予了特殊支持,但长期来看并没有明显解决问题)。因此,国家可以实施有针对性的特殊项目给这些区域注入发展动力。而且必须看到,这些方法在长期预期内会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但短期内的现实目标是遏止其进一步落后的趋势。

三、经济危机及其后果

前文主要阐述了东中欧和中国的区域差异和近期趋势。对中国和东中欧的分析显示出一些长期内稳定的趋势,许多专家乐于据此推断未来走势。但是,所有结论的推断前提是整体经济环境稳定,而始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似乎要摧毁这一前提。尽管我们无法确知这次危机将持续多长时间、会带来多大程度的影响,但我们已获得了一些重要的信息。Lócssei (2009a) 编纂和分析的专题地图便是其中之一,它反映了2008年3月—2009年3月匈牙利 LAU 1 区登记失业人数的变化(图5)。

由图5 我们得到以下几个基本结论:

(1) 此次危机中“最大的输家”是匈牙利西北部。社会体制转型后,匈牙利西北部因区位优势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资,经历了一场外向型部门的迅速扩张(如汽车制造及移动通讯业),并成为匈牙利仅次于首都的最发达地区(Kiss, 2001; Barta-Czifrusz-Kukely, 2008)。然而,经济开放也使它更易于受到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

(2) 布达佩斯作为匈牙利以第三产业为主的最发达的地区,在此次危机中虽不能保全,但所受影响要远远小于西北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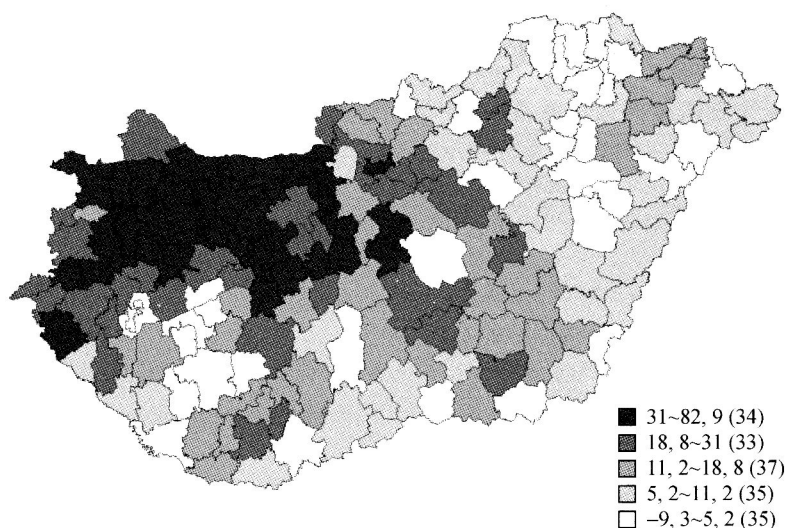


图 5 2008 年 3 月—2009 年 3 月匈牙利官方登记失业人数的变化 (%)

资料来源:Ló csei, 2009a。

(3) 迄今危机对匈牙利欠发达地区的影响相对较小^①。危机后空间差异的情况是首都和全国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扩大的速度加快,但首都以外的其他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程度在降低。由于以上两种趋势是相反的,因此骤然发生地区趋同或趋异的可能性很小。但是,由于中心边缘二元结构的增强,空间结构的不平衡现象可能会有所变化。当然,在危机之后,目前的输家由于具有有利条件,因此有良好的复苏的可能性。同样,危机前的地区差距状况也多少可能会在新一轮经济增长期开始重现。像以前东中欧国家那些因外向型经济而蓬勃发展的地区一样(例如,陷入全球衰退的汽车工业是斯洛伐克,南波兰、捷克共和国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匈牙利也会出现类似的变化。

这种情况在中国也大体相同。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大“赢家”,即与世界市场联系最紧密的东部各省——其中一些年出口额已占到其 GDP 的 50% 以上,它们的失业人数与经济下滑也最多(Csanádi-Lai-Gyuris, 2009)。整体而言,经济危机至少可以缩小省际差异,但是由于失业已影响到大部分外来劳动力,经济危机的负面后果将有可能由中心城市传向边缘地区,也可能从沿海地区传向内地欠发达地区,这可能进一步扩大区域差异——就像 20 世纪 90 年代匈牙利农村转移劳动力首先被布达佩斯的公司裁掉一样。

经济危机过后,东中欧国家与中国的基本处境却不同。自体制转型后,由于薄弱的金融基础,东中欧国家一级的空间规划一直未能弥补自发经济进程中所造成的区域分化。此外,由于较发达地区强大的游说力量以及其较高的投资回报率,旨在促进区域均衡的国家资金大多投向那些相对富裕的地区,(有关匈牙利情况见 Nemes Nagy-Kullmann-Fekete-Szabó, 2000)。造成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植根于这些国家转型中严重的经济衰退及其在所有地区存在的强烈的社会张力。这些环境显然会制约政府实施区域均衡发展的策略,因为倾向发达地区的思维方式更符合选民的期望,有利于增加执政党在选举时获得更多的选票。而且,特别在经济危机时期由于债务较高、财政支出较低而使政府进行调控的空间很小。即使政府有能力调控,它们的主要目标也是促进经济增长,而非缩小地区差异。

相反,中国有大量的财政收入和相对较少的外债,这使得中国有能力实行 5850 亿美元的一揽子刺激方案,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那么一揽子方案会产生什么样的区域效应呢?如果政策重点是恢复经济活力,那么它对区域差异的影响将可能与危机前类似,即各级区域的差异都显著扩大。但是,如果政策

^① 有关空间结构变化的详细描述见 Ló csei (2009b)。

包含改善空间结构以促进贫困地区发展的直接措施,那么中国将获得更长时间的和谐发展^①。无论如何,非常可能的是,东中欧仍将是被动地应对金融危机,而中国则有足够的工具来发挥积极作用。

表9 2009年第三季度外债总额及2009年底外汇、黄金储备占GDP的比重(%)

国家	外债总额占GDP的比重 (2009年第三季度)	外汇和黄金储备占GDP的比重 (2009年底)
保加利亚	60.7	36.8
捷克共和国	32.0	20.4
匈牙利	124.2	33.6
波兰	40.0	15.9
罗马尼亚	45.2	21.0
斯洛伐克	55.0	21.2
斯洛文尼亚	104.3	7.8
中国	7.3*	46.4

注:*代表2009年的预测值。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 QEDS(东中欧国家外债名义值)和 CIA 世界概况(中国外债总额及东中欧国家汇率、黄金储备以及 GDP)计算获得。

四、结论

本文旨在对改革以来中国和东中欧国家的区域差异进行比较分析。计算显示,产业结构对区域差异的影响已大大减弱,而区位和地理毗邻关系的重要性大大增强。总体来说,以前主要的工业区成为经济改革的“输家”,而更邻近全球核心区域的地区则能从这种变化中获益。此外,首都的发展仅仅受到了转型效果的影响,但它们能比其他地区更加迅速地增强优势。

另一方面,中国和东中欧各国都呈现出区域相对稳定的特点。这不仅在于大都市地区的良好、稳定的状态,还在于不发达地区(主要是人口素质低、基础设施差、人员外流严重的边远与农业地区)的稳定状态,它们在任何经济体制下都是落后地区,需要采用有针对性的专门项目促使其发展。

近期全球经济危机对出口导向的区域已显示出负面影响,以往转型中的“赢家”见证了此次严重的经济下滑。相反,传统落后的农业地区面临的新挑战较少,这或许会引起省际间的趋同(如果我们排除那些经济地位相对提高的主要大都市地区)。明显的差别是,东中欧国家缺乏有效的工具调节区域进程,所以随着经济的复苏,新的区域结构主要由自发经济趋势所塑造,而中国政府将在危机后新区域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实施有力的调控,是否能进入一个新的区域趋同时代,基本取决于国家的政策。

参考文献

- [1] Amos, O. M., Jr. Unbalanced regional growth and regional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latter stages of development[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1998, 18:4. 549—566.
- [2] Barta, Gy. -Czirfusz, M. -Kukely, Gy. Re-industrialisation in the World and in Hungary[J]. *European Spatial Research and Policy*, 2008, 15:2. 5—26.
- [3] Bartosik, Z. -Bukietynski, W. -Kaleta, A. Rozmieszczenie i lokalizacja inwestycji—zastosowanie metody taksonomicznej. [Loc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investments—implementation of taxation methods.] *Gospodarska Planowa [Economic Planning.]* 12, 1980.
- [4] Beluszky P. Közép-Európa—Merre vagy? [Central Europe—Where are you?][J]. *Földrajzi Közlemények*, 1995, 119:3—4, 223—232.
- [5] Chow, G. *Are Chinese Official Statistics Reliable?* <http://www.princeton.edu/~gchow/Are%20Chinese%20Official.doc>, 2005.

^① 考虑到一揽子刺激方案资金的38%将计划用于公共基础设施的发展,并以铁路、公路、水利和机场建设为重点。而另外25%的方案资金用于灾后重建,9%用于农村发展(经济观察报,2009-03-07),这一刺激计划(兼顾恢复经济活力和缩小区域差距)似乎在近期更为可行。

- [6] Csanádi, M. *Self-consuming Evolutions. A model on the structure, self-reproduction, self-destr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party-state systems tested in Romania, Hungary and China.* Akadémiai Kiadó, Budapest, 2006.
- [7] Csanádi, M. -Lai, H. -Gyuris, F. *Global crisis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Institute of Economics,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Discussion Papers 2009. <http://www.mtaki.hu/file/download/mtdp/MTDP0905.pdf>
- [8] Domański, B. Industrial Chang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Postsocialist Economy. The Case of Poland[J].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2003, 10:2. 99—118.
- [9] Drajkó, P. Lengyelország közigazgatásáról. [About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of Poland][J]. *Comitatus*, 2004, 14:1—2. , 87—93.
- [10] Economic Observer. *China's Stimulus Package: A Breakdown of Spending.* http://www.eeo.com.cn/ens/finance_investment/2009/03/07/131626.shtml.
- [11] Enyedi, Gy. Processe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Post-socialist Hungary. In: Timár, J. -Barta, Gy. -G Fekete, É. -Kukorelli Szörényiné I. (eds.): *Hungarian Spaces and Places—Patterns of Transition.* Centre for Regional Studies,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Pécs. 2005: 18—27.
- [12] Fazekas, K. Effects of FDI inflows on regional labour market differences in Hungary[J]. *Economie Internationale*, 2005, 102: 85—105.
- [13] [financialexpress.com](http://www.financialexpress.com) *China's economy shows signs of recovery on stimulus*, 2009-02-14.
- [14] Goodman, D. S. G. The Campaign to “Open Up the West”: National, Provincial-level and Local Perspectives[J]. *The China Quarterly*, 2004: 178, 317—334.
- [15] Győri R. *A magyar fejlettségi térszerkezet történeti gyökerei.* [Historical roots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development in Hungary] In: Balás G. -Németh N. (eds.): *Kistérségek a sor végén—a hátrányos helyzet? kistérségek fejlesztési problémája.* [Small region at the end of the row—the problem of development in small regions with disadvantageous conditions.] *Párbeszéd a Vidékért Egyesület, Budapest. Manuscript, in press, 2010.*
- [16] Holz, C. A. *OECD—China Governance Project.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the Production of Statistics.* OECD Statistics Working Papers 1, 2005.
- [17] Kiss, J. P. Industrial Mass Production and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in Hungary.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2001, 8: 4. 321—328.
- [18] Kitchin, R. Positivist geographies and spatial science. In: Aitken, S. -Valentine, G. (eds.): *Approaches to Human Geography.* SAGE Publications. London-Thousand Oaks-New Delhi. 2006: 20—29.
- [19] Lőcsei, H. A foglalkoztatás ágazati és regionális dimenzióinak kapcsolata az ezredvégi Magyarországon. [The relationship of structural and regional dimensions of employment in Hungary at the millenium] In: Nemes Nagy, J. (ed.): *Térségi és települési növekedési pályák Magyarországon.* [Regional and settlement-level growth lines in Hungary] RTT 9. 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Regional Geography. Budapest, 2004: 43—58.
- [20] Lőcsei, H. A válság földrajza—nyertesekből vesztesek. [The geography of the crisis—winners becoming losers] *Világgazdaság* [World Economy], 2009-04-15.
- [21] Lőcsei, H. *Geograph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economic crisis in Hungary.* Conference paper. The 3rd Central European Conference in Regional Science, Košice, 2009b.
- [22] Nemes Nagy, J. *A regionális gazdasági fejlődés összehasonlító vizsgálat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kadémiai Press. Budapest, 1987.
- [23] Nemes Nagy, J. Fordulatra várva—a regionális egyenlőtlenségek hullámai. [Waiting for a turn—the waves of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Dövényi Z. -Schweizer F. (eds.): *A földrajz dimenziói.* [Dimensions of Geography] Geographical Research Institut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Budapest. 2005: 141—158. <http://geogr.elte.hu/ref/pdf/nmj-hullamok.pdf>.
- [24] Nemes Nagy, J. *Terek, helyek, régiók. A regionális tudomány alapjai.* [Spaces, places, regions. Fundamentals of regional science] Akadémiai Press, Budapest, 2009.
- [25] Nemes Nagy, J. -Jakobi, Á. -Németh, N. A jövedelemegyenlőtlenségek térségi és településszerkezeti összetevői. [Spatial and settlement structural components of income disparities] *Statistikai Szemle* [Statistical Review], 2001, 79:10—11, 862—884.
- [26] Nemes Nagy, J. -Kullmann, Á. -Fekete, A. -Szabó, P. A területi fejlődés “állami” és “piaci” útjai az 1990-es években. [“State” and “market” way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1990s] *Területi Statisztika* [Regional Statistics], 2000, 3: 203—220.

- [27] Pavlínek, P. Regional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entral Europe.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2004, 11:1, 47—70.
- [28] Probáld F. Kelet-Közép-Európa és Délkelet-Európa (a volt szocialista országok). [East Central Europe and South Eastern Europe—the former socialist countries.] In: Probáld F. (ed.): *Európa regionális földrajza*. [The regional geography of Europe.] Eötvös University Press, Budapest, 2000; 429—443.
- [29] Rawski, T. G. What is Happening to China's GDP Statistics?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1, 12:4, 298—302.
- [30] Soós, K. A. *Rendszerváltás és privatizáció. Első dleges és másodlagos privatizáció Közép-Európában és a volt Szovjetunióban*. [Transformation and privatization. Primary and secondary privatization in Central Europe and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Corvina, Budapest, 2009.
- [31] Timár, J. -Barta, Gy. -G Fekete, É. -Kukorelli Szörényiné I. Politics, Society and Economy in Space: Spatial Processes in the Era of Transition in Hungary. In: Timár, J. -Barta, Gy. -G Fekete, É. -Kukorelli Szörényiné I. (eds.): *Hungarian Spaces and Places—Patterns of Transition*. Centre for Regional Studies,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Pécs. 2005; 1—16.
- [32] Williamson, J. G. Regional inequality and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 description of the patter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65, 13:4. Part II. 3—84.

数据来源

CIA World Factbook 2009.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

EUROSTAT Regio database.

<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portal/page/portal/statistics/themes>

Populstat. Population statistics: historical demography. <http://www.populstat.info>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ll China Data Center. <http://chinadataonline.org/>

World Bank QEDS (Quarterly External Debt Statistics). <http://web.worldbank.org>

Changing Spatial Disparities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for China and East Central Europe

GYURIS Ferenc

(Department of Regional Science, 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y, Budapest (Hungary), Pázmány Péter Str. 1/C.)

Abstract: China and East Central Europe have undergone remarkable economic changes during the last decades.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spatial patterns and regularities of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these two regions. Following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economic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disparities. Through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d linear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shrinking role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 and the rising importance of geographical neighbourhood is revealed in both regions. The following part deals with the long term stabilities and changes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Through rank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thematic mapping, the regions of stable development or underdevelopment are identified both in China and in East Central Europe, while in the case of the latter region, the usage of the Hoover index reveals the outstanding influence the capital cities exert on their country's spatial pattern of development. Finally, the so far experienced and the possible future spatial consequences of the global crisis are analysed. Here, the emphasis is put on the different room of manoeuvre, and the therefore insimilar aims and practice of spatial planning in East Central Europe (limited possibilities and passive nivellation policy) and in the PRC (stronger financial background, broader interval of instruments and the chance for an active, effective spatial policy).

Key Words: regional disparities; China; East Central Europe; spatial structure; economic crisis